



中国共产党

四川省组织史资料

1949—1987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

1949——1987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省档案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刘周远 庄学君 周 颖

封面设计：曹辉禄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省档案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79.375 插页 6 字数 1800 千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522-x/D·491 印数：1—4000 册

定价：75 元

中共四川省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安法孝		
副组长	彭 塞		
成 员	何盛明（女）	李洪仁	龙玉春
	李荣忠	张 志	张式飞

中共四川省组织史资料编辑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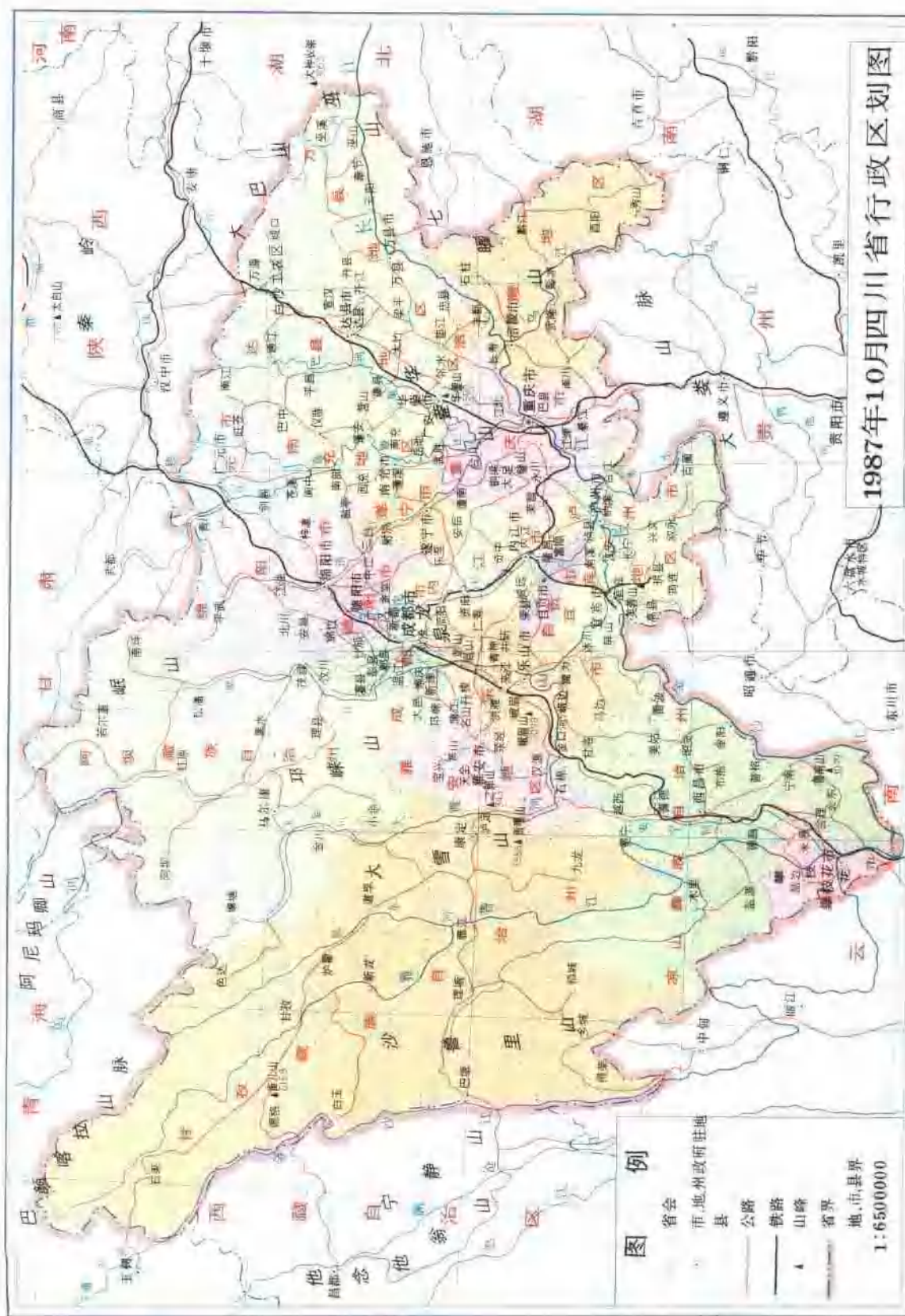
组 长	张式飞		
副组长	隆淑兰（女）	王天凯	龙正菊（女）
成 员	宋光瑞	李 涌（女）	李道一（女）

1987年10月四川省行政区划图

图例

- 省会
- 市、地、州政府驻地
- 县
- 公路
- 铁路
- 山峰
- 省界
- 地、市、县界

1:6500000



总 目 录

四川省行政区划图 (1987 年 10 月)	
编辑说明	(1)
概 述	(3)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	(11)
四川省政权系统组织史资料	(465)
四川省地方军事系统组织史资料	(703)
四川省政协系统组织史资料	(793)
四川省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	(827)
四川省部分企业事业单位组织史资料	(915)
编后记.....	(1266)

编辑说明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包括解放前和解放后两部分。本书收录解放后部分。

本书根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修订方案》和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的《关于征集、编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四川部分的工作方案》进行编纂。

本书编纂时限，起于川康地区解放的1949年12月，止于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1987年10月。包括省、地两级。全书按党的系统、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政协系统和群众团体系统分别进行编纂，另外加收了部分企业和事业单位组织史资料。

各系统组织史资料，均实行“分期划块、纵横结合”的编纂体例，贯彻“广征、核准、精编、严审”的方针，坚持“纵不断线，横不缺漏，本级为主体，层层有交代”的基本原则。

川康地区解放后，经历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政、军、群4个系统，依此3个时期各设3章；政协系统，因在“文革”时期停止活动，根据章不虚设的原则，仅设两章；部分企业、事业各单位，独自成篇，其党政机构同篇兼收，不依历史时期的划分而分段编纂。

解放初期的川康地区，曾设置1省（西康省）、1市（中央直辖的重庆市）和4个行署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区）。不久，撤销4个行署区，合并建立四川省，旋又先后将重庆市、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据此，在第一章里，将“四区一省一市”和以后建立的四川省划为7块，各自独立进行编纂。各省级行政区内的党、政、军、协、群各系统所含的各类机构，分别划为若干小块，平行排列，纵向表述。即：党的系统，按领导机构（含党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省委、省顾委、省纪委）、省委工作机构、设于政军协群系统的党组（党委）、省委所属的下一级地方党组织，划为4块，以块立节，横排纵述。政权系统，按领导机构（含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省政府工作机构和下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划为3块，以块立节，横排纵述。省级各群众团体，包括其垂直延伸部分，各为1块，各立1节，横排纵述。地方军事系统，将

省军区和武警四川部队两部分平行收编。50年代建立的四川军区和以后由四川军区改称的成都军区，在省军区成立之前，曾兼代省军区职能，未予收编。

由于各章各节均按党史时期划断编纂，跨越时期设置的机构和跨越时期任职的领导人，在两个时期内分段收录。但跨越时期的机构和领导人，以一个时期为主的，则采取“上伸下延”的办法，收入为主时期，另一时期不再重复。例如在60年代建立的党政机构及其领导人，在“文革”初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或陷于瘫痪、或被夺权，因而，收录这些机构和领导人任职时间，未止于“文革”开始的1966年5月，而止于其机构瘫痪的1967年1月，“文革”时期不再重复收录。再如涪陵地区于1988年5月划出5个县，另设黔江地区，本书延伸收至1988年5月。

在领导人收录范围上，本书贯彻以行政领导职务定取舍，不以级别待遇为根据的原则。即：在机构收录范围内，担任其行政领导职务的予以收录，而担任非行政领导职务的同级干部则未收录。因此，本书收录与否，均与干部个人的级别待遇无关。在党委领导人的收录顺序上，先书记，后常委；书记均为常委，在常委名录中不再重复。各地解放前，于异地组建的党政领导班子，跟随部队进军，到达该地区后扩大机构，开展工作。对此，则以政权到位时间作为其领导人任职的起始时间，此前情况在文字中予以记述。新建机构前所任命的该机构领导人，以机构建立时间为其任职起始时间，此前任职在文字中予以记述。

关于加收企业、事业单位问题。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企业、事业单位划定级别，实行行政管理，直属人民政府有关厅局。1988年后，明文改称大中型或小型企业，不再划分行政级别。为反映对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上的历史原貌，本书仍按行政级别，主要收录地专级企业、事业单位，同时还收录了若干个非地专级企业。鉴于少数企业、事业单位行政级别的划定缺少文字依据，收录尚不齐全，故称部分企业、事业单位。

概 述

四川省位于中国大西南的东北部，东邻湖北、湖南，南连贵州、云南，西依西藏，北靠陕西、甘肃、青海；周边有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秦岭、大巴山相拱卫；境内有长江（宜宾以上称金沙江）嘉陵江、沱江、岷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水系纵横交织，各水系先后汇入长江，经夔门入三峡，东向出川。

建置沿革

今日四川省是由昔日巴蜀演变过来的。巴和蜀，分别位于现川东和川西，是两个较大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分置巴郡和蜀郡。以后，历经演变，至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 1001 年），置益州（治今成都）、梓州（治今三台）、利州（治今广元）和夔州（治今奉节）四路，总称四川路。四川名称，由此而来。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置中书省，直接统辖离大都较近的地区。而在离大都较远的地区，则分别设置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三年（公元 1286 年），在今四川地区建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行省一词，始于此时。明太祖洪武九年（公元 1376 年），改“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为“四川布政使司”，通称仍为四川行省。清初，划全国为 18 行省，四川行省仍旧。1913 年，北洋军阀政府划四川为 7 道，先称川东、川西、川北、上川南、下川南和边东、边西道，后将盆地 5 道分别改称东川、西川、建昌、永宁、嘉陵道，将边东、边西两道合并改称川边特别区。在全国军阀混战时期，四川几个地方军阀也霸地为治，出现了若干个不断争战的“防区”，实际形成了各行其政的“政区”。1935 年，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派兵入川，撤销“防区”，划全省为 18 个行政督察区和西康行政督察区。1939 年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和西康行政督察区合并，建立西康省，实行川康分治。解放后的川康地区划分为直属于西南行政区的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区、重庆市和西康省。1952 年 9 月，合并上述 4 个行署区，建置四川省。1954 年 7 月，将中央直辖的重庆市划归四川省建制。1955 年 10 月，撤销西康省，将其所属行政区划归四川省。至此，全省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人口 6830 万，1987 年增至 10458 万。

四川人民的革命传统

今日四川人是古代巴蜀人和历史上几次大量进入四川的省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群互相融合而形成的。巴人和蜀人早已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入川人群，又把各民族、各地域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因而，巴蜀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优点和传统。这个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在秦、汉、唐、宋盛世，人才辈出，政绩卓著；在南宋和近代抗击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倾全力以御外侮，民族英雄林立；在新、旧民主革命中，奋勇当先，大批优秀分子成为革命中坚，领袖人物脱颖而出。

遵循厚今薄古的原则，这里对古代川籍名流的胜迹姑置勿论，仅从当代川人的革命行踪而言，亦可窥见其特点和传统之一斑。

在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中，全国有志之士，竞相飘洋过海，寻找真理，以求挽救中国于垂危。当时留日的四川学生“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吴玉章：《辛亥革命》第60页）。在全国兴起的赴法勤工俭学高潮中，四川青年达510余人，占全国留法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和全民武装大起义，不仅埋葬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而且由于清政府急调鄂军入川弹压，湖北空虚，使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人，在起义后的荣县城内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荣县独立，自理县政，建立了第一个摆脱清王朝统治的县级政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川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英勇奋斗，人才辈出。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就有大批进步青年投入革命洪流。早期的这些志士先贤，有的为革命而捐躯，有的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10人中，属川籍的有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4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认的军事家33人，属川籍的有6人，除上述4名元帅外，还有邓小平和杨尚昆。1987年12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词典》收录的已去世的川籍名流79人中，殉职于重要领导岗位的23人。其中在省外参加早期革命斗争的有：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的部队总指挥卢德明，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徐彦刚，中央军委负责人之一的钟汝梅，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总教官孙炳文，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上海工会党团组织书记、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红五军军长罗南辉，民族英雄赵一曼等。四川省内建立的党团组织，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达26年，其间经受了发展、斗争、挫折、再发展的反复磨炼，使这支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更加坚强。四川党组织的顽强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单是在中央和中央分局直属的川康党组织主要领导岗位上牺牲的就有8人。他们是：四川最早的党员和党团组织建设奠基人王右木，四川第一个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创建人和书记杨闇公，以及分别担任省委、省工委、地区特委书记的傅烈、刘愿庵、穆青、罗世文、苟永芳、王璞，还有专门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著名党员车耀先等。

解放川康，共产党全面执政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大西南。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和湖北军区独立一师的配合下，从川东南方向进军四川。第一野战军所属的第十八兵团全部在第七军和第十九军一部配合下，从川西北方向进军川康。自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川到12月底，除西昌地区仍有国民党军残部盘踞外，其余各地先后解放。

从川东南方向进入四川的有：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领的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机关，以及隶属于第二野战军的西南服务团^①。早在1947年即已成立的四川干部队^②和1949年上半年由中共中央东北局抽调干部组成的南下干部大队^③等单位，也先后编入西南服务团，随军入川。入川部队和西南服务团，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东南地区会同地下党组织，分别组建了重庆市、川东、川南行署区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从川西北方向进入川康的有：贺龙、李井泉、王维舟等组成的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

① 西南服务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给新解放地区准备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华东支前司令部及其下辖的若干办事处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组成西南服务团和南下服务团。南下服务团去福建，西南服务团到云、贵、川，其中绝大部分进川。西南服务团于1949年6月正式成立，“总团部主任宋任穷，副主任张霖之、曹荻秋、彭涛”。该团成立后，分别在南京、上海一带招收进步青年和学生，并在南京纳入部队建制，进行编队训练，受第二野战军领导。继后，华东军政大学、东北地区组建的南下干部大队和早期即已成立并在陕南地区待命的四川干部队等单位，陆续加入，队伍不断扩大。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干部大会上说：“去西南参加接管的干部，县委委员以上的有1200人，区乡干部约5000人，此外还有10000多青年学生”。

② 四川干部队，简称川干队。1947年10月在山西临县成立，450余人。其成员，一部分是在重庆、上海、南京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因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内战爆发，被迫撤回延安的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一部分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各部队工作的原四方面军川籍红军；还有少部分是在中央机关工作和在陕北、晋绥地区工作的川籍干部。原定川干队任务是，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形势下“相机入川”，后改为“在鄂陕边区工作待命”。1949年7月奉命重新集中，并补进鄂陕边两郧地区干校和陕南公学的部分学员，队员扩大到698人（其中县团以上干部52人，区营级90人，连排级220人），改称南下服务团，于江震为团长，程占彪为副团长，孔勋为参谋长，田家英和刘瞻、黄觉民分别担任政治处正副主任。1949年9月，该团奉命开往湖南常德，编入西南服务团，改称川干支队。川干支队，随第二野战军入川。

③ 东北南下干部大队。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中央关于配合军事行动，在新解放地区迅速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指示，决定调出在东北地区工作的两广及云、贵、川籍干部回本籍工作，先后调出的云、贵、川籍干部500余人，组成东北南下干部大队。大队长刘披云，副大队长陈林，政委程子健，副政委曾谋。1949年9月初，该大队从长春出发，下旬到达南京。在南京期间，按籍分编，川籍干部主要分配到川南。因程子健、刘披云另有任务，改由陈林任大队长，曾谋任政委，大队行军抵达湖南桃源县，与西南服务团分配到川南来的学员混合编组为泸州大队、资中大队、自贡大队、乐山大队、宜宾大队、新闻大队和财经大队，总称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

会^①，由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抽调干部组成的南下工作团^②。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南下工作团，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西北地区会同地下党组织，分别组建了川西、川北行署区和西康省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自川康地区解放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是川康地区各级党组织全面执政的17年。这期间，各区委（省、市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级政权，完成了土地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步入扬眉吐气的新时代。

划区设治，恢复国民经济

川康地区解放初期的建党建政工作，中共中央早有安排。从老解放区抽调的大批入川干部，在进军途中分别筹组了省、地、县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确定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哪里解放，哪里就有人去接管旧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和人民政府。

解放后的川康地区划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区、重庆市和西康省等6个省级行政区；省市和行署区辖专区17个、市5个；各专区、市辖县、区、市162个；县辖区599个、乡3456个、镇271个。川东、川南行署区和重庆市及其所属的专、县、区级领导干部，主要来自第二野战军入川部队和西南服务团；川西、川北行署区和西康省及其所属专、县、区级领导干部，主要来自西北南下工作团和第十八兵团。川康地区地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参与各地党政机关的组建活动。在组建各级政权机关、统战机构和群众团体时，吸收了当地的爱国知名人士。“四区一省一市”及时招收培训了大批知识青年和工农积极分子，充实基层干部队伍。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从中吸收了大批积极分子参加工作。1950年，4个行署区和西康省共有干部101797人，其中外来干部24953人（军队转业7522人，老区地方干部8736人，其它8695人），原川康地下党员4952人，留用干部22540人，社会招收38290人，从工人中提拔948人，从农民中提拔4318人，其他5796人。干部安排上的这些重大举措，对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时，有一大批国民党军队在川康地区被围歼。其中溃散于这一地区的散兵、潜伏特务，同地主武装相勾结，疯狂进行破坏活动，一度造成局部交通中断、征粮无着、人民不得安宁，危及新生政权。在这种形势下组建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都有当地驻军领导

① 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1949年11月7日，毛主席给贺龙等同志的电报中说：“为了统一指挥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部队，为了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此项机关似可称为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工作。”后将机关名称中加“临时”二字，并决定由王维舟、李井泉任副主任，周士第、王新亭、胡耀邦、廖志高、赵林、龚逢春为委员。

② 南下工作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建党建政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要求所辖各地县按照“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有调有留，保证质量”的原则，各配备二至三套领导班子，以适应支援新解放区工作的需要。1949年秋，部队准备进军川康时，由晋绥分局、晋南行署、晋绥军区全建制和抽调各地县原已增设的同级领导班子，以及党校、行政干部学校、工青妇干部学校师生员工共1万6千余人，组成以李井泉为团长的南下工作团。全团编为5个梯队随军南下。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先后抵达川西、川北和西康省。

干部参加，并且对剿匪、征粮等项中心任务，由部队分片包干，限期完成。从1950年1月到10月，川康滇黔地区共歼灭匪特85万余人，其中川康地区近50万，匪患基本消除，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恢复国民经济等一系列斗争，特别是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四区一省一市”都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在这批积极分子中发展新党员，提拔新干部。在党员和干部队伍扩大的基础上，1952年前后重建和改造了乡镇政权，建立了基层党支部。

撤区建省，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2年9月撤区建省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四区一省一市”的行政建制，先后经历了三次撤并，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也经历了三次较大变化。

1952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合并四川四个区并划四川为一个省”的决定下达后，四川省党政领导机关迅速组成，并于9月1日起行文布政，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区及其领导机构同时撤销。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下达后，中央所辖的重庆市，从7月1日起改为四川省辖市。195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西康省建制，将西康、四川两省合并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同年7月作出的并省决定下达后，西康省即于10月1日撤销，其所辖各地、州划归四川省建制。

在撤区建省后4年多的时间内，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全省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在此期间，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省委采取了加强经济战线领导力量的重大措施。1953年前后抽调大批领导干部、专业技术干部和基层干部到经济管理机关及其所属企业去工作，从组织上贯彻了全党工作由农村向城市的重点转移。

在4年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按照中央部署，四川省于1954年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使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作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1955年开始进行内部肃反，从组织上纯洁了党员和干部队伍。川康合并后，在民族地区的47个县进行了民主改革，培养和选拔了民族干部。1955年12月省委召开知识分子会议，专题研究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和在其中发展党员的问题，把知识、科学和人才问题纳入党委议事日程。

完善领导体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此期间，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加强了党的建设。在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上有所发展，有所变化。一是按照党章规定，实行了党员代表大会制度。中共四

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7月在成都召开，选举产生了首届省委。由此开始，省委领导班子由上级任命制改变为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制，辅以届期内领导班子调整的任命制。二是省委设立由7人组成的书记处，各书记分管各口业务。三是加强省委工作部门建设，从而加强与政府系统相对应的工作部门的经常性指导和监督。省委机关先后设立了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第二工业部、财贸工作部和农村工作部。四是加强党的监察机关。1955年6月，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更名为监察委员会。省首届监委会，由省党代表会议选出，报经中央批准，向中央监委和四川省委负责并报告工作。五是在基层厂矿、企事业单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重大问题由党委决定，突出了党委对行政工作的最后决定权。总之，这是一个强化党的领导的体制。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面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情况，实行这种体制，在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有效领导，保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抓住和解决了主要矛盾。

但是，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弊端，主要是党委的集权和经济建设所要求的科学管理体制相龃龉。1957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揭露和解决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幸的是，在整风运动中，把提出批评意见的许多人，误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川省委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先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四清”运动，以及早期在局部范围开展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都有程度不同的扩大化，伤害了一批干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受伤害的干部进行了复查和纠正。其中对225人因和“胡风案”有牵连而被处理的错案已全部改正；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处理的64724人（其中戴右派分子帽子的50279人）的错案，已全部改正；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处理的错案，早在1962年即已甄别，当时留有“尾巴”的，后来也作了彻底纠正；在“四清”运动中，错案率高达66.5%，对这部分也作了纠正。通过复查、纠正历史错案，挽回了长期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省委工作机构的建设上，先后撤销了农村工作部、财贸工作部、工交工作部，建立了省委农林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和工交政治部，以此加强同政府系统相对应的工作部门的人事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摆脱了对这些部门行政业务工作的干预。

“文革”时期设立的革命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四川的“造反派”于1966年11月提出了“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立即占领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大楼。至此，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人民委员会、省法院、省检察院无法履行职能，陷于瘫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造反派”之间一片混战。1967年5月，成立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次年5月，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四川省革委正式成立。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的省革委，取代了按照党章规定产生的四川省委和按照宪法规定设立的省人民代表大会。省革委设立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和人民保卫组，取代了原省级党政工作机构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工作机构。

恢复党委领导，清除帮派势力

由“军干群”三结合组成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权力机构，也是各“造反派”争权夺利的主要目标。他们千方百计反对坚持党的原则的领导干部，也在各派之间闹矛盾搞武斗，国无宁日，人无宁时，政权职责无法履行，正常工作难以为继。事实证明，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原则，便一事无成。

根据196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决定成立中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实际履行省委职权。在核心小组成员中排除了帮派头目，领导工作大为改观。在1971年8月召开的中共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委，恢复了“文革”前的党委领导体制。1977年12月，四川省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革命委员会，执行人民政府的职能。

粉碎“四人帮”后，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运动中，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帮派体系，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新局面。

加强领导班子“四化”建设， 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使党和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要求，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问题，省委领导班子于1982年进行了调整，将原23名常委减为15名，平均年龄下降5岁，大学文化程度由17.4%上升到40%；将原14名书记减为4人，平均年龄下降10岁，大学文化程度由28.6%上升为50%。1983年4月，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省长7人，仅为上届14人之半，平均年龄比上届下降7.2岁，大学文化程度由30.8%上升到43%。

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是在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的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的。1983年1月，设立了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同时推行了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几年后，全省干部队伍在年龄和文化程度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86年，全省25岁以下年轻干部311123人，约为1979年107942人的3倍；60岁以上老年干部7655人，仅为1979年12737人的60%；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干部304968人，比1979年的181558人增加了68%。

中国共产党
四川省组织史资料
(1949.12~1987.10)